

人民日报学术文库

对外开放四十年 回顾与展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人民日报学术文库

对外开放四十年 回顾与展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著

人民日报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外开放四十年：回顾与展望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经济研究院课题组著. —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115-5681-3

I. ①对… II. ①对… III. ①对外开放—研究—中国
IV. ① F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3279 号

书 名：对外开放四十年：回顾与展望
作 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出版人：董 伟
责任编辑：蒋菊平 钱慧春
装帧设计：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路 2 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09 65369846 65363528 65369512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010) 65363486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 × 240mm
字 数：634 千字
印 张：39
印 次：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5-5681-3
定 价：95.00 元

课 题 组

组 长：桑百川

副组长：陈建勋 邓慧慧 李计广 李玉梅 杨立强 张晓静

成 员：蔡彤娟 陈 寒 丛 雪 邓 寅 郭桂霞 郭小静

郭志飞 姜荣春 胡 玫 胡绵玲 黄冠群 李 姣

林 欣 刘灿雷 刘 凡 鲁雁南 罗子璇 马 欢

潘雪婷 彭 澎 太 平 王红梅 王丽丽 王 伟

王园园 王 尊 徐怡铭 杨露鑫 张彩云 张明霞

赵 芳 赵家羚 赵恬逸 赵晓坤 赵旭梅 钊 阳

郑育礼

序

40年来，中国坚定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书写出一幅以开放促改革和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对外开放40年来，冲破思想禁锢，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中适应、接受、遵循国际经济惯例，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拓展全球资源配置空间，以开放促改革和发展，推动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之路。40年来，中国根据自身经济社会条件，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地理空间和产业领域，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基本格局；不断扩大进出口规模，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41045亿美元，增长近200倍，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大胆吸收台港澳投资和外商投资，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外商直接投资从1978年近乎为零增长到2017年的1360亿美元，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大国，连续26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适时推动对外投资，鼓励企业“走出去”在全球配置资源，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力量，2017年非金融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1201亿美元；广泛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建立紧密经贸合作关系，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履行入世承诺，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完善法律体系，打造良好营商环境，以开放促改革，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加入国际经济组织，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定维护多边经济体制，在开放中与世界各国包容发展、互利共赢。

以开放促发展是中国崛起的宝贵经验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纵观五千年中华民族发展史，开放

的时代，则是繁盛的时代、快速发展的时代；封闭的时期，则是落后的时期、发展迟缓的时期。汉唐盛世，与外部的联系密切，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交往和人员的交流活跃，货物贸易兴盛。汉王朝开辟了古丝绸之路，盛唐时期万国来朝，与外部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开放促进了经济社会繁荣，经济繁荣推动着对外开放，开放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清末时期走入闭关锁国的死胡同，社会经济相对停滞，与世界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泱泱大国成为列强瓜分的鱼肉。新中国成立后，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期走上封闭的道路，与实行市场经济的开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拉大。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出了一条以开放促发展的成功道路，在近4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再次走进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央。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史看，英国在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广泛利用世界市场和全球资源，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建立起符合其国家利益的世界经济秩序，资本的触角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开放与发展相互促动，美国长期保持着世界经济领先地位。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地位迅速提升，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在亚洲“雁行模式”的带动下，中国台湾创造了长达26年的高速增长新纪录，韩国又以30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并于20世纪末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东盟地区也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其他东亚国家一同缔造了“东亚奇迹”。这些高速增长的实现，无一不是得益于经济开放政策。

开放之所以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在于开放可以改变资本、劳动力的投入规模，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升级，促进改革和经济制度变迁。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加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在对外开放中，外商投资流入，增加了资本供给，推动工业化进程，带来新的就业机会，促进劳动力从传统农业产业部门向现代工业等非农产业部门转移，扩大了非农产业部门劳动力就业规模。资本和劳动

力投入增加、产能规模扩大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是对应的需求规模扩大。在对外开放中，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增加获得更高收入，支撑内需扩张，外贸规模扩大，海外需求增加，需求增长与供给规模扩张相对应，促进了经济增长。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加不能解释全部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在对外开放40年中，吸收外资加剧着国内市场竞争，对外投资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对外贸易活动直接参加着国际市场竞争。竞争是技术进步的根本动力，在竞争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催动着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升级，拉动经济更快增长。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资本、劳动力投入增加，以及技术创新都离不开适宜的制度环境，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函数。在对外开放中，要吸收外商投资就必须创造良好的外资营商环境，推进投资自由化，简化行政审批制度，降低行政成本，健全法制，促进公平竞争，完善市场体系，健全市场机制，保障生产要素的市场可得性，这必然会倒逼改革，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在对外开放中，要发展对外贸易，就必须尊重国际惯例，遵循国际经济贸易规则，而当今的国际经贸惯例和规则恰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范，为此，就必须改革国内的经济管理体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对外开放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对外开放促进改革，而改革以建立适宜开放的制度，这种有效的制度变迁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今日中国正处于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期，只有紧紧抓住和平发展期的历史机遇，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开放，积极利用外资，承接新一轮工业革命带来的新的全球产业转移，扩大对外贸易，推动海外投资，拓展国际经济合作，广泛利用世界市场和全球资源，才能取得更快发展。尽管当前世界经济尚未走出亚健康和弱增长的调整期，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并未有效解决，新的增长动力仍未形成，潜在增长率不升反降，不确定因素较多[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预计，未来5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将保持在3.7%~3.8%，不及国际金融危机前10年4.2%的平均增速]。在政治层面上，推崇单边主义的势力有所抬

头，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执政后的多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以及意大利修宪公投为全球化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多边主义停滞、区域开放主义受挫使寻求持续增长动力的中国面临严峻挑战。但基于历史的经验，尤其是4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中国只有走坚定开放之路，才是反制单边主义、维护多边体制的最佳选择，才是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最优途径。

以区域优先开放带动全方位开放是中国开放发展的基本方式

40年的对外开放，中国走出了一条渐进式开放道路。通过局部地区试点优先开放，总结经验，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再扩大开放区域，进而形成地理空间上的全方位开放格局。1980年设置经济特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试验田；1984年又设置沿海开放城市，在沿海开放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1987年实行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1988年设立海南省经济特区；1990年设立浦东开发开放新区；1992年又推出沿江开放战略和沿边开放战略；1994年设立天津滨海新区。2013年以来，分批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2018年海南全省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并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截至2018年4月底，我国已经拥有5个经济特区、16个沿海开放城市、19个国家级新区、12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1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56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5个国家级保税区、14个国家级保税港区、30个国家综合保税区、9个国家级保税物流园区、63个国家级出口加工区、26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17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6个国家级台商投资区、1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各省市设立的多种开发区。

在多种形式的特殊经济区域分别实行着不同的特殊开放政策，大胆探索开放道路，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构建符合国际惯例的规则体系，完善法制环境，提高行政效率，率先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实行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也成为开展对外贸易、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和吸收外资、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前沿，成为国内外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的聚集区，发展为区域经济中心和经济发展极，对其他地区产生显

著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通过局部率先开放，再扩大开放空间，不断提高开放程度和开放水平，可以在渐进开放中培植国内企业的竞争力，有效应对进口商品和境外跨国公司的挑战，避免一步到位的全面开放可能导致的严重冲击，又能够逐步提高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的能力，充分发挥跨国公司投资的技术、知识外溢效应，还能形成地区之间的开放竞争，在地区开放竞争中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在地区开放竞争中形成以开放促改革发展的社会氛围。

新时代中国在推动形成区域、产业、企业、市场全面开放新格局中，需要不断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一方面要依托现有特殊开放区域，完善其管理体制，推进政策、规则系统集成，健全开放型经济体制，提升功能，凸显特殊开放区作为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以及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的集聚中心，以及技术、信息和产业链条等的扩散中心的功能，带动其他地区发展，彰显经济发展极的效应；另一方面又要梳理整合现有各类特殊开放区的政策，推广其成熟的经验和做法，避免错综复杂的各类特殊开放区肢解对外经济政策的统一性，导致开放政策和管理体制碎片化、各地寻求特殊政策的竞争的风险。

全面提升东部沿海地区开放水平。最大限度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的自主权和先行先试权，鼓励其主动进行超前的改革开放试验，与国际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规则对标，强化改革举措配套集成，探索率先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好释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开放领头羊作用，为全国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降低行政成本，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增强我国的全球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服务。

加大中西部地区开放力度。尽管近些年内陆和沿边地区在开放上取得显著进步，但和东部地区的差距仍然很大。东部沿海地区一直以来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发生地和外商投资主要目的地，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国比重达到80%以上。西部地区有着全国72%的国土面积、27%的人口总量、20%的经济比重，但对外贸易仅占全国的7%，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分别不足全国的8%。“一带一路”建设把我国广大中

西部和沿边地区推向对外开放的前沿，中西部和沿边地区有机会发挥后发优势，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大胆进行体制创新，加强与沿海地区、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边境重点口岸、边境城市、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应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特点，发展面向周边的特色外向型产业群和产业基地。中西部地区要利用要素成本相对低廉的条件，抓住外资区位转移的契机，大胆承接外资产业转移，对鼓励类外商投资在资金、用地、所得税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优惠，利用外商投资弥补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中资本、技术、人才、渠道、管理等方面的瓶颈，推进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全面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强化东北老工业基地对外开放的战略地位。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比重高，传统制造业比重大，产品供给结构与快速升级的消费结构不匹配。因此，东北老工业基地首先必须加快转变观念，把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工作置于战略的高度，加大利用外资工作力度，通过利用外资引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其次，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鼓励引进外资持股，特别是引进国外的战略投资者，解决国有股“一股独大”问题，完善国有企业的治理机构；鼓励外商投资生产性服务业，以提升制造业水平；鼓励外资并购，积极引进技术创新能力强、管理先进的外商投资，推动产品结构升级。

发挥比较优势是中国成为贸易大国的根本原因

对外开放40年里，中国依赖劳工资源丰富、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低廉的优势，发展加工贸易，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大胆吸收外商投资，扩大出口，逐步成长为世界制造中心和国际经济贸易大国。从1978年对外贸易额仅区区206亿美元扩张到2017年超过4.1万亿美元，在2014年后连续三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之后，2016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被美国超越，2017年重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有效利用比较优势，也充分消化利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避免了改革发展中效率提升可能伴生的失业率上升。

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致力于培育竞争优势，努力拓展发达国家市场和多元市场，在扩大出口的同时，不断降低关税水平，减少非关税壁垒，扩大进口规模，弥补中国能源、资源缺口，保障产能规模扩张，满足广大社会公众需求，保障世界分享中国经济成长机会、与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形成中国与世界广泛的经贸联系和利益关系。

在新时代，中国不仅要不断扩大货物贸易，而且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仅要巩固贸易大国地位，而且要建设贸易强国；不仅要依托比较优势，而且要强化竞争优势。

要巩固世界贸易大国地位，首先必须夯实实体经济，巩固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保障在全球贸易中占有较高份额。未来中国面对劳工等要素成本上升、出口产品成本低廉的传统优势削弱的压力，要巩固作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地位，关键是从生产领域入手，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和效率，消化成本上升压力，保持传统制造业生产环节的竞争力；通过发展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服务业，完善产业配套能力，稳定制造业投资；同时，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高端制造业。

其次，要扩大服务贸易，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我国服务贸易已进入增速趋稳、结构趋优的新阶段。2012年以来，服务贸易年均增长10%以上，其中，离岸服务外包年均增长超过20%；技术出口年均增长超过40%。扩大服务贸易，要以服务业的发展为基础。我国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的主体，占GDP比重突破50%，但其发展还面临着国际竞争力较弱、创新能力低等问题。开放是服务业寻求新突破口的重要途径。扩大服务业开放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关键是要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提升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需要在服务业内部分工日益细化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服务企业内部治理制度，提高服务企业创新能力，改善服务质量；积极参与国际服务分工，发展服务外包，打造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挖掘特色文化的绝对优势，扩大文化服务出口。

我国正处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战略机遇期。要迈向贸易强国，必须明确贸易强国的标志。作为贸易强国，一是进出口规模大，在全球贸易中的影响力高；二是拥有一批掌握关键技术、知识产权、销售

渠道和著名品牌的出口商品；三是出口企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掌握国际定价权；四是拥有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主导全球价值链的全球公司；五是能够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甚至主导国际经贸规则变迁。为此，建设贸易强国需要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发力。

一是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培育更多掌握先进技术的出口产品。加大国家对新技术基础研究的投入，推动新技术应用，跟踪国际标准，适当提高技术标准，促进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加强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鼓励中外联合进行新技术研发，支持国内企业通过自建、合资、合作等方式设立海外研发中心，鼓励跨国公司和境外科研机构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鼓励企业引进先进技术，促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塑造创新的制度环境，鼓励企业技术研发投入。

二是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塑造国际名牌。同质化的产品极易被替代，国际贸易的竞争归根到底是质量的竞争。只有培育起以技术、品牌、服务为核心的产品质量优势，实行质量立国，提升产品品质和性能，改变廉价低质的产品形象，才能塑造出国际名牌。也只有成为质量可靠的国际名牌产品，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掌握国际定价权。为了提高出口产品质量，需要更多采用国际先进质量标准，建立国际认可的产品检测和认证体系，构建质量倒逼机制，形成出口企业重视产品质量、崇尚提升产品品质的社会环境。

三是打造我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我国企业面对着全球型公司整合价值链的激烈竞争。只有建立我国自己的全球型公司，充分利用全球的技术、资本、市场、人才、信息、营销渠道、先进管理经验等优质资源，在全球设置采购中心、制造组装中心、研究设计中心、营销中心、服务中心和管理中心，通过价值链若干环节外包，或企业并购，形成产业链各环节的竞争优势，打造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才能避免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提升出口产品的增加值。

四是主动参加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制定与把握国际经济规则是一国软实力的体现，获取制度性话语权是中国成为经贸强国的重要标志。只

有把握全球经贸规则变迁的趋势，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全面积极参加全球经济治理，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我国的贸易利益，形成互利共赢的国际经贸格局，为提升我国出口竞争力、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重视吸收外资和推动企业“走出去”是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主要路径

对外开放40年来，中国积极吸收外商投资、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已经成长为吸收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大国。为吸引外商投资，中国从出台优惠政策到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不断提升营商环境吸引力，从优惠政策引资到制度环境引资，扩大市场准入范围，放宽外商投资限制，对外资企业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把外资企业作为中国企业，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中国市场成为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市场之一。外商投资不断扩大，不仅弥补了中国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双缺口”，而且大幅度提升闲置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的利用效率，产生了技术、知识的溢出效应，倒逼国内的改革，推动着经济成长。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扩大海外投资，完善海外投资政策、法规，改善海外投资管理和服 务，越来越多的企业广泛利用全球资源，实现了国内外的资本、技术、管理、信息、人才、营销网络和供应链、价值链优化配置。

新时代中国从高速增长转向经济追求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一致的。“五大发展理念”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在开放发展理念下，积极利用外资，发挥外商投资促进创新的功能，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和协调发展，带动国民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使社会公众分享发展成果。

为了使外资发挥上述功能，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深化改革，调整完善引资政策。通过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行政效率，避免中央政府取消、简化的行政审批事项被地方政府接过去，演化为地方审批，避免审批制度简化了但懒政无为让外资企业无所适从，真正降低制度成本，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完善职业

教育和培训制度，提高劳动者素质，推进劳动力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化；通过分配制度改革，保护知识产权，激发全社会技术创新的热情；通过金融体制改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资本的价格；通过土地制度和房产制度改革，降低房地产成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通过信息管理制度改革，提高信息传递速度，降低信息交易成本。总之，提高供给侧改革，降低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企业投资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调整外资政策，按照“五大发展理念”设定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引导外资为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发展服务，瞄准我国经济结构升级方向，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使外资能够分享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机遇。继续优化外资营商环境，核心是努力塑造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营造积极利用外资的社会氛围，协同各个政府部门行为，形成积极利用外资的合力，保持利用外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促进外商投资便利化，降低外资企业税费负担，提高外资企业税后收益率，完善法律体系，落实外资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政策措施，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继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公平保护外资企业知识产权。

在“走出去”扩大海外投资的过程中，要注重防范海外投资风险，不仅是东道国的风险，也要注重与国内经济发展相协调，实现海外投资增长与国内经济稳定、实体经济健康相结合。鼓励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现国家战略、提升我国技术研究开发能力、建立中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以及带动出口和就业的对外投资，如国内短缺以及国民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源或原材料开发，能够获得国外先进技术和研发资源的海外并购，能够扩大设备、技术、品牌、劳务出口的对外投资，应享受财政、税收、金融、外汇、保险、投资便利化等多重倾斜政策支持，主要实行项目备案制。考虑到当前特朗普政府极力推动制造业回流，谋求对主要竞争者的产品加收进口关税，大幅减少本土企业税负，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要避免诱发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加速撤离中国市场，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对于一般商业性的境外投资，充分确立企业作为市场投资主体的地位，由企业自行决定投资。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我国法规、投资目标地法

律以及国际法相悖的境外投资，列入禁止投资目录即负面清单，不予核准。对于与企业主营业务无关或关联度低的项目、动机不良的境外投资项目，列入限制投资领域。谨防部分企业可能会利用内保外贷等渠道转移境内资产。完善境外投资的事中、事后监管和服务。

坚持创新开放是中国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依托和保障

对外开放40年来，中国在大胆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经验中，不断创新开放的政策措施和方略，从设立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特殊经济区，从实行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到实行沿江开放、沿边开放战略，走向全方位开放，从创设上海经合组织、金砖峰会，到推动制定出台《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从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谋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不蕴含着中国智慧，体现出创新开放的理念。创新开放构成了4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国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的依托和保障。

新时代，离不开对外开放促进创新发展，又要不断创新开放。只有不断创新开放的形式、内容、体制，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把握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权，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获得更大收益，更好实现开放发展、创新发展。世界经济论坛（2017）曾指出中国正迅速成长为世界创新中心，大幅缩小了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创新差距，然而在将科技创新市场化，转化为实际的竞争力方面，中国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一是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和外贸综合服务平台等，能够借助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提升外贸发展动能和国际竞争优势。跨境电商是中国外贸发展的新增长点。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拓展了传统商品市场的外贸功能，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有助于中小企业实现外贸专业化、规范化经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二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创新对外投资方式，要以国家的对外投资

战略规划为引领，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依托产业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私募股权基金等开拓新的投资渠道，探索 PPP、股权投资等投资模式，完善对外投资管理机制和服务体系，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

三是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鼓励其主动进行超前的改革开放试验，与国际高标准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规则对标，强化改革举措配套集成，探索率先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可以更好地释放其改革开放领头羊的作用，为全国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降低行政成本，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增强我国的全球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四是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港是设在一国（地区）境内关外的特定区域，世界著名的自由贸易港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鹿特丹、迪拜等，是目前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典型的自由贸易港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境内关外开放的特征。即地理上位于一国境内，行政上处于海关管理关卡之外，货物、资金、人员流动便捷，绝大多数商品免征关税。二是经济自由化。依托信息化监管手段，自由贸易港将取消或最大限度简化入区货物的贸易管制措施，最大限度简化海关申报手续，大幅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有着自由进出的物流、自由交易的贸易体制、自由化的资本金融制度与自由的国际人员管理体制（赵爱玲，2017）。三是港口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联通海陆空，具备转口贸易、离岸贸易、离岸金融、仓储、物流、加工制造等综合性功能。

我国海岸线长，离岛资源丰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有助于打造对外开放层次更高、内外资企业营商环境更优、对周边乃至全国经济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开放型经济创新发展。

回望40年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总结40年对外开放的经验，不仅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未来更好推进对外开放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加社会广大公众福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

组织课题组，对40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理论演变、对外贸易发展、吸收外商投资、对外投资、国际经济合作、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展开专题研究，形成本书，以飨读者。作者依次为：第1章：张晓静；第2章：姜荣春；第3章：赵旭梅、桑百川；第4章：张晓静、刘凡；第5章：胡玫、杨立强；第6章：王丽丽、张明霞、胡绵玲；第7章：杨立强；第8章：刘灿雷；第9章：邓寅；第10章：王伟、王尊、彭澎；第11章：王园园、李玉梅；第12章：钊阳、鲁雁南；第13章：张彩云、赵恬逸；第14章：桑百川；第15章：蔡彤娟、马欢、郭小静；第16章：郭桂霞、黄冠群、赵芳；第17章：太平、李姣；第18章：陈建勋、郭志飞、徐怡铭；第19章：杨露鑫；第20章：罗子璇、丛雪；第21章：赵晓坤；第22章：邓慧慧、赵家羚；第23章：邓慧慧、潘雪婷；第24章：李计广；第25章：林欣、王红梅；第26章：陈寒、郑育礼。全书由桑百川、李计广修改统稿。

40年对外开放道路艰辛曲折、内容丰富多彩，本书观点难免纰漏，恳请读者批评包容。

桑百川

2018年9月18日